

·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



近代中国 知识阶层的转型

杨小辉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

杨小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杨小辉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ISBN 978-7-80745-870-8

I. ①从… II. ①杨…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5900 号

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

作 者: 杨小辉

责任编辑: 张晓栋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870-8/K · 137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金国华

副主任：闫 立 倪正茂

秘书长：何平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华 王 蔚 闫 立 刘 强

关保英 汤啸天 杨 寅 吴益民

何平立 张森年 金国华 倪正茂

章友德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总 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意即蕴含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而《中庸》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

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探求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上海政法学院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起跑点,而且是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展示学术风采、呈现富有创造性思想成果的科学平台。古代大家云:“一代文章万代稀,山川赖尔亦增辉”;“惟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我相信《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反映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学术风格和特色,而且将体现上海政法学院教师的学术思想的精粹、气魄和境界。

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雅克·勒戈夫曾言,大学成员和知识分子应该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我相信《学术文库》将凝聚上政人的思想智慧,人们将从这里看到上政人奋发向上的激情和攀登思想高峰的胆识与艰辛,上政人的学术事业将从这里升华!

祝愿《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精神,薪火传承,代代相继!

金国华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教育制度的转换	25
一、作为士绅生产机制的科举	25
二、科举批判与革废	31
三、新式教育的逐步确立:以学制为中心的讨论	39
四、制度转轨引起社会失衡	54
第三章 都市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形成	88
一、觉醒与萌芽:“中等社会”	88
二、知识自觉:“学术社会”	97
三、激进知识分子眼中的“知识阶级”	107
第四章 知识分子栖身的文化建制	126
一、大学	127
二、研究机构——以中央研究院为例	150
三、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探讨	161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193
一、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193
二、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关系	194
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96
四、知识结构	197
五、职业选择目标(或机会结构)	197
六、价值取向	198
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21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属于第一轴心让位于第二轴心的时代“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社会变迁的动力已从第一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转为科学与技术的进步^①。从知识角色上来说,属于第一轴心时代的士绅,承担着阐释、维护“哲学上的突破”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传统的功能;从社会角色上来说,他们是“四民社会”中坚,与官僚帝国体系互为因果。进入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所依托的制度化环境对比士绅阶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生活空间由乡村转入城市,知识结构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转换到以“生、光、化、电”等自然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分科之学,思想资源亦从传统“道统”逐渐演变为“民主、平等、自由”等西方价值和理念。在“四民社会”解体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新知识阶层日益远离乡土,基本上断绝了与乡村世界的联系,生活在沿海、沿江的都市里,以学校、报刊、出版、学会、研究机构等作为自身的组织与制度依托,从社会中坚退到社会边缘,成为曼海姆所说“自由漂浮的阶层”,生存形态、思想资源、思考方式、发言对象、个人与集体诉求,以及制度化环境均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

根据罗荣渠的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呈现为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四重奏,其结构性断裂的特征十分明显,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更是中西之间的冲突^②。而近代以来的各种运动,知识阶层无役不与,以致有学者将中

①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把人类历史分成四个时期:“普罗米修斯时代(语言、工具、火的使用等)”、“古代文明(规划、组织)阶段”、“轴心期”和“科技时代”。其中,他特别强调人类历史的“轴心期”,认为“这个轴心期位于对人性形成最有成效的历史点”,它产生了“能使人领悟和信服的,可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的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雅斯贝斯同时还有这样一个判断:即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哲学的突破”到20世纪,人类处于第一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动力来自“哲学突破”时期,如苏格拉底、耶稣、孔子等人提供的哲学观念;从20世纪开始,人类通过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进入科技时代,这一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自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参见K. E. Boulding, *The Mea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Great Transition* (N. Y.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65), 第2章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Great Transition。)国际上最早明确地将雅斯贝斯所称的科技时代名之以“第二轴心时代”的是卡伦·阿姆斯特朗和尤尔特·卡曾斯(参见王志成:《走向第二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平》,载段丽萍编:《走向第二轴心时代》,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第十三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国的现代化称为知识分子主导型^①。因此研究嬗变中的知识阶层,很可能是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②。

基于此,本书将中国知识阶层从传统“士绅”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法,从制度与群体变迁的维度来考察此一转型的具体过程、机制和逻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士绅与知识分子被不同的学者频繁使用,分别用以指涉不同的对象。如果不对之进行辨析,轻易套用这些用法,则可能陷入严重混乱。

作为传统中国的知识阶层,“士绅”在明清两代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从外延以及概念的操作化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学衔和功名来界定与确认士绅集团的成员。无论是通过科举“正途”,还是捐纳“异途”,只要取得哪怕是最低级功名(生员),都应归入“士绅”行列。整个士绅可分为上、下层两个集团:下层集团包括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士人;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举人、贡生、进士)的以及拥有官职——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士绅组成^④。

“知识分子”,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也不过是九十多年的事情。考虑到这种时空上的差异,我们不得不先探究其在西方的历史渊源。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 *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 *intellectual*, 这两个词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

● *intelligentsia*

intelligentsia 源自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含义。从起源来说,它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俄国、德国和波兰。波兰社会学家盖拉(Gella)认为,*intelligentsia* 由波兰人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于 1844 年最先使用;后经勒德里基(Waclaw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认为:“从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来看,西欧属于资产阶级主导型,日本属于官员主导型,……中国则可称之为知识分子主导型”(学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 页)。

② 汪一驹认为:在近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中,知识阶层提供了危机的征候和中国社会改革的目标。参见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 xii.

③ 实际上,只有从明清时期开始,士绅才作为一个完整的、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集团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以后科举的机能发生了某种质的转变,举人、生员等科名逐渐变成中一种终身的资格,享有相应的身份特权(参见吴金成:《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的诸问题》,载东洋史学会编《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④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 页。

Lednicki)考证,发现俄国人别林斯基(V. G. Belinsky)1860年在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这个词;而德国的“intelligenz”则是1849年用作与intelligentsia相似的同义词。派普斯(Richard Pipes)谓intelligentsia是“一群受过教育、有进步思想的人”^①。

波兰和俄国出现的intelligentsia,属于类似的社会阶层(Social Stratum)。拉伊夫(Mare Raeff)和别尔嘉耶夫(Berdyaev)认为它与俄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有关,盖拉则认为它是在彼此认同的态度和文化价值上建构出来的^②。举例来说,屠格列夫小说《父与子》所刻画父子两代人的形象,即反映了当时俄国intelligentsia的精神面貌:父亲代表第一阶段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心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崇尚西欧的思想传统,喜欢讨论哲学、文学和艺术;到了儿子一代,从父亲的经验中认识到不能光谈理想,必须要考虑现实问题,他们不再高谈哲学及抽象的东西,而从实际的社会改革着手。尽管两代人有上述差异,但他们却都对俄国现状感到不满^③。这就是派普斯所说的“进步的态度”,“一种敢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的精神。

以色列学者康菲诺(Michael Confino)曾综合各家的意见,把intelligentsia的特征归纳为五点^④:

(1) 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

(2) 经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

(3) 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

(4) 希望在问题背后找出最后的答案。

(5) 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intelligentsia是身在经济、社会都比较落后的环境中,但又接受了西方形形色色的观念,并因而与社会产生疏离,对现存秩序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知识群体。

① Aleksander, Gerll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ntellectuals*, ed., Aleksander, Gella, Beverly Hill: Sage Publication Ltd., 1976, p12.

② Ibid., pp. 12—13.

③ 参见陈国祥:《从文化观点谈知识分子——访叶启政教授》,收入周阳山主编:《知识分子与中国》,时报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4页。

④ 转引自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见《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 intellectual

至于 intellectual,则是因法国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而流行的一个概念。这一词汇起源于西欧,与法国大革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事实上,intellectual 一词,最初是指一批在法国大革命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 intelligentsia 不同,intellectual 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体,没有类似的阶层含义,他们会经常批评现存的社会标准和措施,喜欢在咖啡店高谈阔论,放言理想,鼓吹实证哲学,充满浓厚的革命气息^①。德雷福斯事件是近代知识分子运动的分水岭。“intellectual”一词从此被赋予了社会良知与公众道义的内涵。以至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认为:“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涵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②。

● intelligentsia 与 intellectual 的差异

究竟源自东欧的 intelligentsia 和西欧的 intellectual 两者之间,有何分别?

米歇尔斯(R. Michels)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里曾探讨何谓 intellectual,但米歇尔斯在解释 intellectual 的时候,intelligentsia 亦同时交替出现,两个名词穿插运用,仿佛毫无分别^③;而稍后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的另一篇文献里,只谈及 intellectual,而 intelligentsia 并未出现^④。可见如何区分 intelligentsia 和 intellectual,西方学者较少讨论,然而,从两者的起源来看,他们在相似之中亦有不同之处^⑤:

(1) 从地域而言:intelligentsia 盛行于东欧,而 intellectual 则流行于西欧和美国。

(2) 从结构而言:intelligentsia 属于当时特别的社会阶层,有较明确的认同感(identity)和群体意识,由城市中的精英分子(urban elite)组成,而 intellectual 的成员则较为复杂,是社会上成员复杂的群体。

(3) 从内涵而言:intelligentsia 除了担任批评社会的角色外,还特别强调专业

① Lewis S. Fruer, What is an Intellectual, i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ntellectuals*, ed. , Aleksander, Gella, Beverly Hill: Sage Publication Ltd. , 1976, p. 48.

②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8 页。

③ R. Michels, Intellectual,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ed. Edwin R. A. Seligman New York: Macmillan Inc. , 1963, pp. 118—124.

④ Edward Shils, intellectual,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Inc. , 1968, pp. 399—414.

⑤ 参见罗慧燕:《知识分子与国家》,香港人文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 页。

能力,intellectual 则着重心态上对相应社会角色的扮演,以致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把 intelligentsia 称为“技术知识分子”,把 intellectual 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①。

●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大约是 1919 年上半年转道日本传入中国的,起初被译作“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比较广泛地为社会所接受和使用,用以指涉由新式教育所催生的社会群体^②。

夏丏尊发表于《一般》杂志 1928 年 5 月号的《知识阶级的命运》一文提出:“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作者还指出:“知识阶级的正体实近于幽灵,难以捉摸。”^③

1936 年初版《辞海》收录了“知识阶级”一词,其定义是:“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育者,狭义指受有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劳心之劳动阶级,如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因其不能自存,须依资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为生,故为非基本阶级,亦为非支配阶级。”^④

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地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⑤

由此可见,中文里“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与中国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以及新式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用以指涉接受过学校教育,拥有较多科学文

① 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1 页。

② 如 1919 年 2 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便多次使用“知识阶级”一词。周作人在 1919 年 3 月翻译的一篇英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也出现了“智识阶级”一词。

③ 夏丏尊:《夏丏尊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1 页。

④ 转引自景凯旋:《何谓“知识分子”》,《书屋》2006 年第 5 期。

⑤ 朱自清:《论气节》,原载《知识与生活》第 2 期,1947 年 5 月 1 日。转引自吴为公、李树平编《朱自清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2—393 页。

化知识的人。

● 本书界定

理想的定义应当既有理论的深度,又尽可能满足“操作”的要求。但现实中,作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循理论与操作、定性与定量两个目标,尝试着为“知识分子”下一个初步的定义。其中的理论定义大体作为操作定义的基础,而操作定义则负责为理论定义提供清晰性和准确性^①。

我们的理论定义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的产生以现代职业分工为先决条件,他们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在社会中,主要从事各种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和传播,而这些知识却又并非仅仅来自他们个人的直接经验^②。鉴于转型时代中国新式教育远未普及的历史情境,与上述理论定义相应的操作定义是:受过新式中等(中学)以上教育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尽管大多数近代知识分子出身于士绅家庭,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城市的环境,已使他们与乡村世界和传统士绅阶层分离区别开来^③。

进一步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致是一群有如下特征的人:(1)受过新式教育、有相当的知识水准;(2)他们的思想取向与士绅的“保守”相对,有“求变、趋新”的趋势,这就常常使他们与传统及现实政治、社会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3)“知识分子”,以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分化及职业分工为先决条件,所赖以活动或生活的组织,通常是近代城市所哺育、造就的制度化环境,如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专门的研究机构等。

中国知识阶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大体发生于清末新政至 1930 年代,这一承先启后的时段,与张灏所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大致相当^④。具体原由如下:

其一,从知识阶层的生产机制或资格养成机制来说,根本性的变动始于清末新政改科考、兴学堂、废科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流动中断,城乡逐渐分离,传统社会中

①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② 参见罗伯特·K.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4 页。

③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9 页。

④ 有关转型时代的论述,参见张灏:《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见《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的知识阶层“士”，由于再生产机制崩溃，后继无人而逐渐消亡^①。废科举后不久，严复即曾加以评论：“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②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则认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③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更是明确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④。

现代知识阶层的生产机制从清末兴学堂开始，经由1904年的“癸卯学制”，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才逐渐确立起来。“壬戌学制”所确立的“六·三·三·四”的学校系统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无根本性变动。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资格养成的必要机制在当时已经基本定型。

其二，从知识阶层群体意识^⑤的嬗变来说，大约1903年前后，区别于士绅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意识，即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开始萌芽^⑥。最初他们以亘古未有的“中等社会”自居，演至民国，读书人则称自己为“知识分子”或“知识阶级”。他们竭力为自己营造一个有异于传统士大夫忠君卫道的形象，这个新的自我形象的内涵，更多的是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对民众的关怀，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心^⑦。值得注意的是转型时代“知识阶级”的定义相当宽松，被归类为“知识阶级”的人，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千差万别，不论是大学教授、艺术家、医生、小学教师、新闻从业人员，或者是学生，都可以算是属于“知识阶级”。尽管“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与传统士绅相较，并不是一个很统一的社会阶层，但它却代之而起，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后者所遗留下来的空间。到了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已形成共识：“士”(或“士大夫”)

①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外日报》1906年1月10日。

③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④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⑤ 有关自我认同对于阶级、阶层生成的重要性的论述可参见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导论。汤普森令人信服地写道：“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己的历史的人定义的，而归根到底，这是唯一的定义”“而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它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

⑥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⑦ 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页。

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人,知识人代之而起宣告了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形态的终结,现代形态的形成^①。

因此,无论是从维系知识界的社会学纽带——教育,还是从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新阶层认同的形成来说,我们将研究起点设置在清末新政阶段,而将下限划到 1930 年代,都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古典形态的“士绅”以及现代形态的“知识分子”,学术界早已从不同角度做出了相当丰富、深刻的研究;这些研究,自然就构成了本书讨论赖以展开的基础。

这里我们仅从近代中国知识阶层转型的角度,对与之相关的研究,略作评述。

● 功能主义范式下的士绅社会研究

19 世纪,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精英与科举取士之间的联系,他们将精英与绅士等同起来,最早引入了“gentry”这一术语。但真正的专门研究是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始的。韦伯注重地方士绅与官职的联系。在《中国的宗教》讨论社会精英的开篇中,他即作了如下论断:“十二个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在中国主要是由任官的资格,而不是由财富所决定的。此项资格本身又受到教育,特别是科举所决定。”^②在韦伯看来,中国存在着一个性质基本相同但并非是由官吏组成的政治精英阶层,这些人大多已通过了科举考试,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和习俗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未做官之前或告老还乡之后,凭借知识和社会地位,对当地官员发挥潜在影响;同时,又由于在土地方面拥有殷实的财富,受到地方百姓的尊重。

虽然韦伯对中国社会中的这一特殊阶层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论认识,注意到了士绅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由于资料所限,其论述难免有些笼统,缺乏深入精细的实证考察。受韦伯影响,后来张仲礼、费孝通、萧公权、瞿同祖等人都运用“绅士”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华帝国晚期的地方精英。他们注重考察士绅作为地方精英的功能、士绅的个人背景、社会流动,以及在基层共同体中的角色,大多证实了韦伯的看法。

1955 年,张仲礼用英文出版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根据大量方志资料进行统计,对 19 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职责、特征、人数,以及与科举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据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②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3 页。

张仲礼估算,以 19 世纪太平天国运动为界,之前和之后,这个绅士阶层总人数分别约为 110 万(其中 12 万即 11%左右属于上层绅士,35 万左右即 32%是“异途”绅士)和 145 万(其中 20 万即 14%左右属于上层绅士,“异途”绅士占近 53 万即 36%)。士绅及其家族拥有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特权,并且在社区与国家之间履行了司法、行政、治安、经济、教育等重要功能^①。1962 年,张仲礼又推出姊妹篇《中国绅士的收入》,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绅士》结尾部分所提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该书对绅士在担任官职、幕僚、塾师,以及从事地方和亲族公共事业服务、从事地产或商业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作了分析。据张估算,19 世纪晚期,士绅加上直系亲属总数约为 750 万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 2%,但他们却获得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24%,平均每人年收入为 90 两银子。而占总人口 98%的普通百姓,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仅为 5.7 两。士绅人均收入为普通百姓的 16 倍。如果以扣除税收后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他们的收入则是普通民众的 17.7 倍^②。

1960 年,萧公权在《中国乡村——19 世纪的帝国控制》一书中,对士绅、家族、仓储等地方控制途径分别进行了详细论述。萧公权认为,“说绅士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实曾在没有绅士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绅士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近代以来,士绅为了扩大活动范围以及自身安全,相当一部分人迁入城市,在此情形下,士绅不但不能成为帝国控制的有效中介,相反在年成不好时,还会加剧农民的不满,阻碍政府对地方秩序的维持。此外,萧公权还特别指出,虽然对比普通百姓,士绅可以更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但需要保护这一事实本身就揭示了他们在社会上的真正位置:他们享有特权,但不是统治阶层的成员”^③。

1962 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美国出版。他特别考察了士绅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深入分析了地方利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该书第十章专门论述士绅的构成及其与“地主”、“文人”等概念的区别,士绅的声望和特权以及群体归属感,士绅发挥影响的渠道,士绅的家庭,士绅在地方行政中的角色(如地方公益、保甲、地方武装、教育等),营私和不法行径,官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等问题。由于该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1991 年版。

② 此处所引为中译本,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费成康、王寅通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0—342 页。

③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pp. 316—320, pp. 506—507.

书的相关研究简洁全面,因此备受称道^①。

上述著作通过引进“士绅社会”这一概念,巧妙地联结了明清以来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士绅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平衡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一方面,士绅依照国家政策,管理本地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他们在地方上又代表着平民百姓,向国家官僚机构表达意见^②。传统中国由于士绅阶层的存在,实质上成就了一种“双轨政治”^③。

虽然以张仲礼等人为代表的士绅社会研究,在后来研究者对传统中国精英阶层与地方社会的经验观察与分析中,时常受到批评和挑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理论在诸多方面对传统中国社会解释的有效性。一方面,它们已成为学者们探讨相关问题时,几乎不能回避的参照,或对话的理论体系,而且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学术对话中,关于中国社会结构与士绅的认识得到深化,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也在批评与反思中萌生;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社会富于洞察力的理解与诠释,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深邃眼光和超凡睿智,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仍是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比如费孝通在其研究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大量士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传统的双轨政治在乡村逐渐蜕变成为一种单轨政治,乡土社会被日益侵蚀。

● 科举与士绅社会流动

从20世纪中叶起,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流动理论,以实证的方法对作为士绅生产机制的科举是否真的能使贫寒子弟出头的问题进行研究。1947年,潘光旦、费孝通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对清代915份贡生、举人、进士的考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他们当中父辈有做官记录的共609人,占66.56%,上五代之内有做官记录的则达到793人,占86.67%,由此证明,科举虽为平民创造了晋升的条件,但士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和优势而获得相对更多的机会^④。1949年,许烺光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流动》一文,利用四个地方的县志,

① 瞿同祖:《清代的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 Franz Michael, *Stat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7, No. 3, 1955, pp. 419—433.

③ 所谓“双轨”乃是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的政治格局。进一步说,即是县以上通过官僚集团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乡村则通过士绅实现社会整合,两者互为依靠,相互补充。参见费孝通:《基层行政的僵化》与《再论双轨政治》,收入《乡土重建》,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见《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55页。